

2000年,诗歌《敕乡(外一首)》选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《2000年中国诗歌精选》,之后,作品多次入选中国作家协会、诗刊社主编的中国诗歌年度选本。

2003年,出版散文集《东方走廊》、诗集《敦煌》。

2001年—2007年,由中国摄影出版社、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出版西部人文地理图书《神秘故城》《名胜古迹》《绚丽风光》《天下雄关》《天下雄关与丝绸古道》《古道西风》《敦煌雅丹地貌》《张掖丹霞地貌》《永远的敦煌》《西部神韵》《走进罗布泊》《中国胡杨》等,总发行量十余万册。为《中国国家地理》《华夏人文地理》《中国旅游(香港)》《户外探险》等杂志特约撰稿人。

2001年,散文《西北望》在中央电视散文栏目播放,并获得甘肃省敦煌文艺奖。

2002年,散文《嘉峪关下》被选入《中国西部人文地图》,同时,该文被选入《新课标中学生人文读本》。

2003年,散文《遥远的城堡》被拍摄为电视专题片,并荣获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。散文《天界随想》被拍摄为电视专题片,并荣获第二界甘肃省敦煌文艺奖。

2005年,组诗《长城地带》荣获《飞天》十年文学奖。同年十月穿越罗布泊,考察楼兰等西域古城,其长篇系列散文《走进罗布泊》在多家报纸连载,《户外探险》《中国旅游(香港)》等摘登。

2006年,被甘肃省文学院授于荣誉作家称号。

2007年,荣获甘肃省黄河文学奖。其诗歌在《诗潮》“中国当代诗歌扫描”,《星星》“每月推荐”“文本内外”,《绿风》“西部诗人”等重点栏目推出。11月,承担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年度重点选题“沿着石窟的走廊,佛走进了中国”,并在当月杂志发表;12月参加诗刊社第23届青春诗会。

## 出生地中的个人诗歌地理

燎原

早在1990年前后,胡杨就以一个快乐的小伙子的形象,体味着在嘉峪关作为一个诗人的快乐。那一年的一个诗会期间,在集体参观了嘉峪关城楼等历史遗迹后,他又带着我和诗人林染等三人,时而进入伏藏着黑山崖画的河谷,时而钻进地表之下的魏晋墓室壁画长廊,最后,又驱车爬上长云缭绕的祁连山中。当他站在山腰向我们朝下指点,仿佛整个河西走廊都尽在他的胸中。

从兰州启程向西,铁路和公路线就进入了狭长的河西走廊。接下来几个大的地址依次为: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嘉峪关、玉门、敦煌,再接下来,便是河西走廊的终端和进入古西域的始端——两个已经湮失在历史中的著名地址:丝绸之路大漠北路的起点玉门关;大漠南路的起点阳关。这无疑是一些显赫的名字,而当我们再把武威、张掖、酒泉依次还原为它们的古代地理名称:凉州、甘州、肃州,整个的河西走廊便会立时摇撼起慷慨苍茫的边塞诗

歌风云。从《凉州词》中：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的凉州向西，直到走廊尽头的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。

接下来的20世纪50年代，这条走廊又以中部的玉门石油基地、酒泉钢铁集群为核心，在李季等著名诗人的笔下，凸起了一个以大西北工业开发建设为主题的诗歌时代。

再接下来的1980年代，是将雄浑苍凉的人文历史地理，纳入当代集体英雄主义的抒情；以及文化寻根思潮中以敦煌为源头的文化史诗。由此形成了1980年代诗歌史上波澜壮阔的西部诗歌大潮，并留下了一长串诗人的名字：昌耀、杨牧、周涛、章德益、林染、李老乡……以及以河西走廊为主体框架，结构了自己宏大文化史诗《礼魂》的杨炼。

显然，这是一片为“诗歌战争”所反复“洗劫”的空间。当这片地域所有显在的历史人文资源都被席卷一空，胡杨是否意识到，在嘉峪关作一个诗人又是何等的渺小与荒凉？

这种现象显然会影响到诗人的心态。2007年，在青海曾有一个以“地域诗歌”为话题的小型研讨会，耐人寻味的是，当一些内地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地域诗歌写作进行了肯定之后，反倒是本埠的青年诗人们表示了淡漠和排斥。在内地诗人们看来，青海以及整个西部地区苍凉广袤的自然地理和丰富的人文历史，具有天然的诗歌元素。而在本埠青年诗人们的眼中，这样的资源已被当年的西部诗歌所穷尽，他们眼下需要的，恰恰是打破这种地域性的拘囿，与当下的主流写作接轨。

对于西部时空做出历史文化题旨上的追认，这是当代诗人们本能性的反应，但由此而形成的，已基本上是西部诗歌阴影下复制性的写作。而清楚这一真相并拒绝复制的本埠诗人，却难以打开新的写作空间。这大约也是胡杨曾经面临的尴尬。

现在，胡杨却悄然刷新出一片新的地域诗歌风景。但这样的新，并不是全新空间的建立，而是在对固有地域形态返还基础上，以对微量新鲜元素的发现和积累而形成的更换。这正如他在《敦煌草原上》这样的描述：

只有一朵花独立于草原之外  
一年一年的雨季，雨水低处流  
低处的这一朵花  
却带领自己的孩子，向高处走  
敦煌草原上，由一朵花而一片花

为刚刚相识的两只羊  
引路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

这是一首看似简单的诗作，却又是经历了诸多观念层次的转换之后，一首具有“发现”性质的诗作。在进入这样的诗歌风景时，胡杨已经经历了对陈积为自己“传统”的西部诗歌惯性思维的反复清洗，及其施加在这片地域上宏大历史文化符码的清洗，使之清水洗白银式地还原出清晰的原生生态。然后，



顺着“低处的这一朵花”所指示的小径，寻找走向高处的一朵又一朵……

这也就是说，胡杨是在经过了地理分层学上多层覆盖的剥除之后，使大地在原生态的呈现中重新确立自己的诗歌基点的。但这又是一种困难的写作，尽管它断绝了复制，但也失去了依傍。当他摒弃了旧有诗歌余势的承托，便等于从已经启程的飞翔中重新回落地面。但属于胡杨自己的写作正是由此开始，他在只能紧贴地面一点一滴的细微发现中，以本时代写作中手工作坊式的罕见耐心和体温注入，打造自己诗歌的金蔷薇。

这是一种笨拙的方式。当然也是结实有效的方式。在胡杨敢于并甘于选择这种方式时，显然是凭借着一种巨大的潜在动力——当他进入这样的写作，便真正进入了置身于自己出生地的温情中——敦煌是他的出生地，嘉峪关是他的生息地，而整个的河西走廊是他的精神地理家园。由此我们还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，迄今为止关于这片地域的无数诗篇，大致上无不属于过客的咏叹，诚如前边所述，诗人们写尽了这一集地理、历史、文化符号于一体的空间所引发的感怀，但他们唯一不能、也没有条件去做的，正是胡杨这种以唯有对自己出生地血缘性的漫长注视，才能在那些普通、微小物事上“看见”的光束：“西天的云彩，降落于西天之涯/骑马的人，一身鲜亮/像裹了玉/那是穿过了玉门关的玉/成器了”。

胡杨的写作由此显示出了在探底性的蜕变中找到根基后，全面收复失地的脉络。他从宏大的集体主义抒情和公共性的历史文化复制中，步步后退到出生地的个人微观地理，然后在清空了的地理版图上，进行勘探式的重新扫描：《凉州词》《酒泉》《马鬃山一带》《马牙雪山》《敦煌峡谷》《七棵树》《哨马营》《甜水井》《玉门关下》《阳关春雪》……这些诗歌标题中的主体词，无一不是或大或小的地理自然名称，被弃置在远去的诗歌风云之后，但当胡杨以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映照串联起这些灯盏似的地址，整个河西走廊便再次倏地亮了。

但这绝不是最后的风景。胡杨用他的写作表明，无尽的诗歌风景，永远存在于有待打开的空间之中。

## 胡杨诗歌印象

胡 弦

在嘉峪关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是一只燕子？

看胡杨的诗《嘉峪关上的燕子》：

垛口上，站着燕子

城台上，站着燕子

阁楼上，站着燕子